

《新华日报》的金库

《新华日报》于1938年至1947年在重庆坚持发行了近十年，是让当时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共大政方针的主要宣传阵地。周恩来亲自兼任报社董事长，社长是潘汉年，还有一名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专管报纸出版经费筹措和发行工作，他是一名老地下党员。那时陕西延安的共产党人缺衣少食，不可能有什么经费资助，要在国统区维持一份大报的生计，熊瑾玎可谓呕心沥血。谈及此处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年轻的商人。

这位在重庆办酒精厂的商人，当年刚届而立之年。他后来回忆：

从1940年到1946年，我一直通过周竹安，为《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每当报馆经费短缺之时，熊瑾玎总是直接的而更多是通过周竹安找我商借，成百万，上千万，总是要多少就借多少，一口答应。这些资金，不但不计利息，而且连法币贬值的损失也不要报馆负担。……朱端绶等人不止一次地讲过：“那时的国防动力酒精厂就是《新华日报》的金库，随时需要就随时到周竹安那里去取用。”

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夫人，她说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年轻老板名叫任宗德，周竹安是任的助手，也是经熊瑾玎安排在他身边的地下党员。

任宗德与昆仑影业公司

·申平之·

任宗德的大名对于老一辈电影从业者应该不会陌生。1947年在全国公映的昆仑影业公司制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应该算得上创票房奇迹的电影。而任宗德就是这部影片的主要投资人和制片人。

成立昆仑影业公司

1946年10月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在即将离沪返延安之前，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约见了任宗德和及其妻子周宗琼。陪同会面的还有李维汉、邓颖超、翦伯赞、华岗、范长江、沈钧儒等人。

周恩来对我谈了许多话，……概括起来，周公对我的要求和嘱托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我把大孚出版公司办下去；二是要我全力支持好新组建的电影制片机构，坚持住这一文艺阵地。……

相较于出版公司，投资发展电影制片机构的事，十分曲折复杂。以凤凰联谊社成员为班底，组建新的电影制片机构，定名为“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宣告成立。投资人是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在艺术创作方面，由阳翰笙牵头，制片由孟君谋负责。

联华影艺社一成立，就决



1947年，任宗德(第二排左四)与昆仑部分主创人员在上海徐家汇昆仑公司摄影棚

定投拍两部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不久，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表明了坚决退出的态度。此后，联华影艺社改组为影业公司。任宗德提议采用“昆仑”这个名称，大家也表示赞同。1947年5月，由联华影艺社改组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

仅过数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即将杀青之时，“夏云瑚突然提出他不愿再干了，要撤出资金，出国另谋发展”。为顾全大局，任宗德急忙拿出几万美元给摄制组，以保证最后拍摄和后期费用。任宗德尤觉不能辜负周恩来的信任和厚望，决定担负起总管全公司投资经营的重担。之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均由他任制片人，由他出资筹资进行拍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让人无比欣

慰的是，当年昆仑公司影片的上映，一举打破了外国影片独霸中国电影市场的垄断局面。

损失最为惨重的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第二天，刚进城并担任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的夏衍给任宗德打来电话：我们回来了！任宗德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周恩来在1947年10月临别叮咛说“等着我们回来！”的情形。

6月下旬，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发来电报，邀请任宗德到京商议要事。飞抵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底层大客厅举办晚会，周恩来在麦克风前说，今天举办晚会，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是欢迎昆仑公司总经理任宗德先生来到北平，任宗德听得受宠若惊。回沪前，经与多方商议，任宗德决定投拍故事片《武训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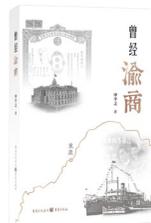
该片由著名导演孙瑜编导，40年代中期，孙瑜偶遇陶行知，陶先生当时正在重庆宣扬“新武训运动”，即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介绍清末山东堂邑县人民武训通过卖艺讨饭积攒钱财兴办办学的“苦操奇

行”。孙瑜激动万分，决定改编成电影剧本，尽力推上银幕。

1950年底《武训传》全部拍摄完成。在经过上海市、华东局、中宣部、文化部及政务院多轮审看，甚至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和百多位中央领导一同观看后，顺利完成所有规定程序，拿到“准予上映”的执照。

1951年2月，《武训传》正式在全国上映，“一时好评如潮，夸赞盈耳，推崇备至”。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武训传》被判定为一部进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的影片，有“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

而刚届不惑之年的任宗德，可能是这场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人。1952年春，昆仑等八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次年春，又合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宗德被安排任财务处副处长。1954年夏，经组织安排，他被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任基建处副处长。离沪去京前，为了结束昆仑公司，任宗德变卖个人资产，将当时公司负债的几十亿元(旧币)全部垫补，自己的财产已所剩无几。



(摘自《曾经渝商》，重庆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新闻界强化了不平等

18世纪60年代，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相对充裕的报纸。几乎每个州都有一到两份自己的报纸，还有船只从欧洲带来的海外报纸。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到了1770年，北美十三州已有25家报纸了；他学习印刷和编辑工艺的波士顿已经拥有英国海外帝国制作的所有报纸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印刷商发现报纸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提案：报纸带来了广告客户，可以用来跟其他印刷商和供应商交换库存和材料，还招揽来了所有重要的构成财务命脉的“零件印刷”生意，比如海报、名片和印刷表格。报纸不仅仅是纸张，它还是许多印刷商、印刷店赖以存在的基础。

殖民地报纸一般有4页，印刷数量从几百份到几千份不等，上面刊登了许多广告，偶尔有信件，还有一些国际、殖民地和本地新闻的专栏。新闻和报纸在美国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殖民地社会一度是新兴的，是跟英国大都市连在一起的。有些殖民者离开是为了逃离旧大陆，另外一些则是为了寻找新的机遇，并不想背弃英国。

在殖民地和英国的新闻界，奴隶造反和暴动都是普遍被关注的问题。正如印刷历史

18世纪

美国新闻界“剪切、复制、粘贴”

学家凯瑟琳·阿姆斯特朗指出的那样，新闻界说奴隶“鬼鬼祟祟地躲在沼泽地里”，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报告称这些人“自信地游走在建筑环境里，‘折向南行，一路烧光了所有房屋’”。新闻界强化了种族差异和殖民主义的不平等，它呈现出来的殖民时期的美国的殖民者社会是一副正常、理性的样子，并把这个社会描述成经过验证的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剪刀加糨糊”式的新闻

在创制报纸的过程中，主编通过新闻界利用了信息共享网络和新闻传播网络。如今，任何一个读18世纪报纸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所谓“剪刀加糨糊”式的新闻工作的盛行，其做法就是将故事从其他报纸上剪下来，贴在自己的页面上，通常——但不总是——不注明出处。这种借用的形式很多。

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道：“我还将我的报纸视为另一种传达教诲的工具，鉴于这种观点，我频频从《旁观者报》和其他道德作家那里摘抄片段。”约翰·亚当斯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筹备报纸时是如何尽其所能地从各处搜集材料的：“晚上，

正在为第二天的报纸做准备工作。这真是一份奇怪的工作。编造段落、文章、事件等。让政治引擎转起来！”

1758年，富兰克林和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亨特被任命为邮政局的副局长。不久，他们就确立了免邮费交换报纸的做法，信息得以跨州共享。这是为了“不阻碍报纸的传播，在许多情况下，报纸都对政府有用，对商业和公众有利”。

在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国内，随着1793年法案的通过，作为一种报纸制作方法，邮政交流的做法流行开来。1793年法案保障了编辑通过美国邮局免费交换报纸的权利，对订阅者实行低邮资政策，确保19世纪期间“快马邮递的骑手及其邮包一到，印刷商就把外地新闻放在本地最新头版上”。

这样的活动还利用了报纸、新闻信和以其他形式传播的手写信息之间的寄生关系。明确承认使用信件起到了两个作用。它默认了一个事实，在早期，作为一种系统性的信息交换形式，写信是一项比印刷更为特权的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这意味着只

有有钱有权的人才负担得起信息获取权。

建立殖民网络的支撑作用

除了把大西洋世界，至少是有文化的自由民连接在一起，新闻界也帮助美国形成了自己的联结和身份。殖民地的新闻界需要靠欧洲供应报纸和信件的同时，它还有赖于东海岸的报纸印刷商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

生产、销售报纸所获得的资金对建立殖民网络起到了支撑作用。成功的报纸，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可以为印刷商未来的商业成功提供基石，而且作为交换品，还可以被用来与殖民地的其他印刷商拉关系、建网络。

我们可以通过1765年年初刊登在纽约和费城报纸上的广告大致了解殖民地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多么平淡无奇的方面，都可以在报纸的版面上找到。这些本地启事显示商业和日常生活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有助于地方社区焕发活力。除了读者消费这类广告，它们

的作者也不得不拜访或写信给印刷商，并与那些回复启事的人通信。

报纸印刷商还不得不掌握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所需的复杂的基础设施。一旦一份报纸准备好了，印刷店就得排好活字，然后手工印刷，再送到书商或批发商那儿，并通过一个由街头小贩组成的密集的网络传递，由此才到达购买者或订阅者手中。

印刷商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来保持联络以确保自己盈利，并为自家的报纸寻找有新闻价值的题材。管理报纸订网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别的城镇维持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印刷商、店主和送报骑手组成的群组并说服他们在当地分发自己的报纸也并非易事。

报纸既表明存在真实的物理网络和连接，又显示它们的文本同样构建起了另一种网络和连接。在幕后，在摆排活字和传播印刷品的过程中，一个共同体被锻造了出来。危难时刻，它可能会集结起来，发动革命和独立运动。



(摘自[英]马修·J·肖著 陈盛译《墨色事业：从英国内战到美国内战的报纸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